

# “最后一课” 回归教育灵魂

没有煽情、没有调侃，只有温情的叮嘱。7月16日，清华大学4000多名研究生在校体育馆上了“最后一课”，校长陈吉宁的临行叮嘱聚焦于两个字——良知，他嘱咐学生要坚守良知，拒绝做“高知坏人”。(7月17日《北京日报》)

今年的毕业季，很多大学校长的“最后一课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无论是怎样的风格，煽情抑或调侃，温情抑或激励，作为母校留给学生的最后一课，大学校长那些发自内心的“唠叨”，为无数青年点燃了对大学最后一课的集体怀念，对未来自身人生的美好向往。

良知是为人处世的根本，是社会道德的底线。从社会转型、竞争压力到功利思想，从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腐化堕落到金融危机……可以说，社会良知的底线一再被触碰，人们的内心也不断被拷问。有没有良知，跟学

历高低无关，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。但是，一旦逾越良知底线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却似乎与学历高低息息相关。正像校长陈吉宁转述一位外国企业家的观点，国际金融危机，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，而是由聪明孩子造成的。
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学子在顺利完成学业、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时大都是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。但是，走上社会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很多事情“身不由己”。这种“两难”的抉择甚至会伴随一生，不断地推着向前走，在你浑然不觉间，也渐渐地推开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。凡事总有变与不变，清华大学校长温情地叮嘱学生要坚守良知，拒绝做“高知坏人”，正是预见到了在未来不能变，却很有可能变的方面。

孔子说过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在同

现实的博弈中，你或许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，也或许各行其道，但你始终不能与良知渐行渐远。坚守良知，是学子们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个考验，也将是终身的考验。或许有一天，你才能感悟到，自己创造的并不比坚守的更可贵，在你的身上，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品格和社会良知要比业绩的成功更具有人格魅力。

说到“最后一课”，不由得让人们联想起世人熟知的，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虽然它们的时代背景、讲述内容各不相同，但流露出来的坚守的气节却让人倍感温暖和振奋。清华大学校长的“最后一课”，回归到了教育的本质和灵魂，受众不应该只是即将毕业的这4000多名学子，没有毕业的，已经毕业的，甚至高校生活已经久远的人，都应该

是受众。因为，在坚守良知这条道路上，没有“最后”这一说。 宋华

“太可怕了！现在的幼儿读物延续了黑暗的传统！”近日，有网友在微博中晒出一组《丑小鸭童话故事》：丑小鸭并没有变成美丽的天鹅，而是在离家出走后被宰杀，成为“烤鸭”。该故事引发不少网友大呼：“接受不了！”甚至有专家斥责此类新编童话，是“毁三观”的反社会作品，有关部门应予禁止。(7月16日《武汉晨报》)

## 为儿童树三观 靠的不是童话

对于儿童读物的争议，历来纷纭不休。卢梭就反对小孩子读寓言，认为寓言有坏心术，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，失去了天真，所以要不得。而钱钟书反对的理由则是，童话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，愈幼稚了，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。问题是，寓言、童话、少儿读物真有这么大的影响、教育作用吗？我看未必。

像此番遭到舆论一致指责的黑暗版的“丑小鸭”，平心而论，读完以后我并没有发现故事有多不堪、结局有多可怕，相反倒觉得有些滑稽可笑——用流行的话讲，谁叫这只“丑小鸭”入戏太深，真把自己当白天鹅了。当然，反过来想想，会不会是因为网友们太敏感了呢？

就拿本人的经历来说吧。小时候，我就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几篇美好结局的童话，打有记忆起，看的全是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的连环画，听的也是《隋唐》、《说岳》的评书。但这些成天喊打喊杀的“战争故事”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暴力论者，相反塑造了我最初的正义观念。而随着年岁日增、读书愈多，原先那些小人书里的糟粕部分也慢慢被岁月所荡涤。回头来看，小时候读什么书，书里讲什么故事，对一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更重要的是，要相信人类是有朴素是非观的，哪怕他只是个孩子。

事实上，真正影响孩子“三观”形成的因素，与其说是童话故事，毋宁承认是社会这部大书。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讲：“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，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么一个世界、什么一个社会，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。”无论是经典童话还是黑暗版“新编童话”，都没有说过“贪污光荣、清廉可耻”，但为什么会有小学生从小立志“长大后要做贪官”呢？这究竟是童话的问题，还是社会大环境使然？

因此，作为家长、政府和社会，真正应该反思的是“今天我们怎样做父母”，看看自己能否“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地度日，合理地做人”。若能，则就算儿童读物有些“剑走偏锋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孩子们也会自然地去芜存菁；反之，要是道德失范、正义匮乏、小人得志、好人吃亏的大环境不变，那么童话越纯洁、越经典，恐怕孩子越会被教得简单、幼稚，长大了越可能处处碰壁上当。 王烽

神木面临的财政收入下降、政府投资放缓的现状，并不是个案。有必要引起对县级财政风险的警惕，理顺县级事权与财权，降低县级财政的风险。

## 神木财政亏空传言 并非空穴来风

日前，神木发生一起因网络“谣言”而出现的群众聚集。与通常的因污染项目、土地、强拆等原因不同，神木的这次聚集，看起来是对当地主要领导去向的关注，实际上是担心县级财政的可持续性：因“传言”财政出现巨额缺口，难以支撑民生投入，深受百姓拥护的免费医疗和15年义务教育，可能要被终止。

前些年，伴随着煤炭价格的高企，神木经济以拼投资、上项目过上了十分滋润的日子。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民生工程，更是享誉全国。但随着煤炭价格下跌，经济放缓，神木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。虽然神木县财政局长以“选择性”的数据，证明财政收支完全正常，但从神木县财政局、发改委等部门的多项数据来看，的确难以掩盖神木财政的真实情况。

根据年初预算，2013年，神木的财政总收入要完成230亿(包括上交给上级的各项收入)，增长4%；地方财政收入要达到60亿，增长13%。从一季度实际情况看，全县财政总收入37.27亿元，同比下降26.4%；地方财政收入12.82亿元，同比下降1.4%，完成全年任务60亿的21.4%。而在去年一季度，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50.67亿元，同比增长22.5%；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3亿元，同比增长85.3%，完成了全年任务的23.4%。

按此形势，神木完成既定目标并不易。而全年的支出，却是根据年初预算收入来安排的。无疑，肯定会有某些项目受到影响。而当地民众恰恰担心的，或许就是民生的财政支出难以得到保障，担心会终结免费医疗和15年义务教育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说神木就遇到了财政危机，政府保证上述两项民生工程投入的钱还是有的。

但应该看到，由于神木的发展模式，走的就是资源消耗型路径，拼投资上项目，终将难以为继。免费医疗和15年义务教育，到底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，的确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

而且，神木面临的财政收入下降、政府投资放缓的现状，并不是个案。笔者在基层调研中，听到很多县的财政局长抱怨，“财政收入库，今年难当家”。神木的资源条件相对较好，在县级财政中还并不是最差的。

神木尚且如此，其他一些无资源、少投资的县，就更困难了。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，由于当前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中，县级财政承担了过多的事权，而又缺少稳定的税源，经济波动直接冲击到县级财政。

神木事件，不过是财政增收为主的各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再加上主要领导可能被调离的传言所引发。

以此观之，有了神木的这次事件，有必要加大对县级财政风险的关注力度，尽快改革和调整中央地方财权关系，理顺县级事权与财权，降低县级财政的风险。 匡贤明



泄漏镉量20吨、事发河段镉超标80倍、污染波及300公里河段、下游上百万人饮水安全一度受到威胁……这组数据反映了2012年初发生在广西河池市境内、被专家称为“世界罕见”的龙江镉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。

7月16日，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法院、大化县法院对2012年初发生在广西河池市境内的龙江镉污染事件11名责任人做出一审判决。3名官员中两人获刑3年6个月，1人获刑4年6个月。 新华社 蒋跃新 图

## 药业腐败不绝因共犯结构庞杂

知名药企葛兰素史克曝出贿赂丑闻，最新的消息说共涉及700家公司5亿美元，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媒体报道的一些贿赂伎俩早已不是什么商业秘密，而是公开的行业潜规则。例如一些用于“开会”的“运营成本”，很大一部分被套现出来据为己有、大肆行贿。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这类医疗商业贿赂便有一个雅称——学术营销。

就像火腿肠里没有火腿一样，学术营销和学术无关。它只是一个可以把利益群体串起来的链条。这一所谓的学术营销中，除了已被披露的葛兰素史克和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多家旅行社外，还包括至少两家跨国药企，并且上至工商、物价、人社等职能部门，下至大量的基层医院。可以想见，有多少人沉溺其中对“学术”中毒上瘾。

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国打击医疗行业的商业贿赂不乏雷霆手段。中央纪委监察部早就将工程建设、土地出让、医药购销、政府采购等列为六大重点打击领域，抓获了一大批“药老虎”，其中有原国家药监局负责人郑筱萸和郝和平等。但是和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样，下了猛药却始终不见效。并且更为诡异的是，素来非常高效的美国《反海外腐败法》在对付药企海外腐败时也显得软弱无能。去年的辉瑞行贿案涉及8个国家，如今的葛兰素史克案涉及700家公司，无疑让无往不胜的法律也面上无光。

何以中美两国的反腐败法律都拿药企腐败没办法呢？还是要从医药行业强大的“共犯机构”中找原因。政府主管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的官员和医疗专家，往往会同社会保险机构、医生、

药剂师、医院、医疗设备和医药工业的生产厂家和代理商等行行为密谋串通，形成了一个各个环节紧密相连、所有参与者共荣共生的利益共犯结构。这一共犯结构与食品产业共犯结构相似，都非常庞大且难以攻破。有本书揭发这一共犯结构的书名叫《喂不饱的地球》，其实喂不饱的是人类贪婪的胃口。

一面是喂不饱的腐败胃口，一面却是嗷嗷待哺看病的病人。深挖药，方能广积德。虚高的药价里有一个黑洞洞的洞口，唯有不断深挖深挖再深挖，才能让阳光杀灭腐败的躯体。对于任何国家的反腐部门来说，“深挖药”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首先向官商勾结开刀，最终向人类的贪婪开刀。

虚高的药价里有一个黑洞洞的洞口，唯有不断深挖深挖再深挖，才能让阳光杀灭腐败的躯体。 付瑞生

## 院长应以证据证实出国因公非游玩

教科院院长袁振国等人出国行程单被曝光，袁振国说该行程单未采纳，空口无凭，真实的行程是怎样的？近日，网友曝光一张2011年12月3日-12日的航班信息及行程单，称中国教科院院长袁振国等人赴阿根廷、巴西考察，10天的考察期内，除10小时公务活动外，其余均为包括赌场在内的游览行程，考察团中还有袁振国的妻子袁某。

袁振国回应有三点：一是网友曝光的行程单是旅行社曾经做过的方案，根本没采纳；二是教科院规定出国访问中文化考察参观费用一律自费；三是妻子有自己的出访任务，同行目的是为了节省中国教科院的英语翻译开支，且与教科院经费无关。

我们希望袁振国的回应是真实可信的，但人们也有理由要求袁院长诚实回应公众质疑。事实上，袁振国的回应仍嫌抽象，缺乏说服力。

袁振国说网友曝光的行程单未被采纳，那么中国教科院实际采纳的是一份什么样的行程单，可否公布于众？在网曝行程中，“公务活动”与赌场、探戈表演、桑巴舞表演

相互穿插，表明旅行社也是心里“有谱”，所作安排也不像是自作主张。只有公布真实行程，才能证明“赌场游”不存在。

袁振国之妻袁某据说有自己的出访任务，其行程是如何与中国教科院

出访行程“琴瑟和鸣”的？时间合拍，路线合拍，这可是“高难度动作”。此外，难道教科院成员都不懂英语？袁某成为教科院翻译之后，她如何完成自己的出访任务？

现在真相在袁振国院长手中。要堵塞天下悠悠之口，其实不是什么难事，只需公布三样东西：实际出访行程单、出访成果报告和费用清单，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此事也不能只由袁振国本人自行回答，纪检部门应及时介入。自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出台以来，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大力整治三公消费，袁振国院长等人出国之事，虽发生在两年前，亦不可轻易放过。 杨于泽

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“婚托”等现象，北京市住建委启动综合执法检查，如果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参与教唆、协助“婚托”，都将从严查处；购房资格核验系统中，出现“闪婚”三次的身份证号将自动“告警”。

## 以户籍限购房 破坏社会伦理

北京市住建委在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，有一名叫王芳(化名)的京籍女子，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短短5个月里，先后3次与不同的外地人结婚、离婚，3人年龄从20岁到60岁不等。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，这种5个月内和不同对象闪婚闪离3次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。然而，它符合非正常的钻空子的逻辑。

假结婚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钻京籍家庭不限购的政策空子。一些非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士为了在北京买房，又不符合连续几年纳税的条件，所以才要合演这种和北京人假结婚的把戏。有哲人曾有逃亡的机会，但他仍然选择了饮鸩而死，他说自己不愿意悖逆法律，哪怕是坏的法律。今天恐怕无法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平常人，不必用道德的标准去臧否这些钻政策空子的人，当然也不必对他们作褒奖和拔高。说这些京籍的婚托“帮助”外地人购房，只是一个辛辣的笑话，每单生意3万至5万的进项才是问题的实质。

利益丰盈的时代，需要拿利益作为分析现象的工具。事实上不难发现，无论对于真夫妻的假离婚，还是对于陌生人的假结婚，有关方面的规劝都不是道德规劝，而是非常现实的利益规劝。比方说那句著名的“楼市有风险，离婚须谨慎”，以及这次律师所告诫的“婚托不离婚，你将怎么办？”利益规劝确实有几分让人忧虑之处，它的逻辑是，你都知道去钻法律的空子，焉知那个和你假离婚或假结婚的人，他(她)就不会钻你的空子？假离婚被演成了真离婚，或者假结婚结束了之后居然离不净，购房所获得的利益将要大打折扣。

以后者为例，外地购房者与北京婚托结婚，在购房成功之后是需要赶紧离婚的。可是，如果婚托勃然翻脸，不承认自己只是这场大戏之中的演员，而是拿着结婚证要求分割作为婚后财产的房子，事情将会如何了结？如此烦恼，还都只是“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。离婚闹剧和结婚闹剧的最大承受者，恐怕仍然是那个抽象的“社会管理秩序”。政策制定者想要达到的“秩序”，是令行禁止，是说一声“限”民众便自觉自愿揣度自己的条件实现“自限”。不料，总有那么一些为利益铤而走险者，不按简单规则出牌，处处试图通过相反的方向来到“大陆”。

当调控因此而漏洞百出，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去堵漏，因为和结婚离婚的假戏真做比起来，这才是更大的“不利益”。对婚托“闪婚”三次告警，对机构参与教唆协助的严惩，底线也就是寥寥数张，能不能奏效还不好说。就如同那些购房者，他们未必不知道假结婚假离婚的风险，但与利益相比，他们愿意冒险。若是市场真的已然疯狂，非“限”而不能奏效，那么这些“限”字当头的政策是不是一定要与户籍挂钩，却是值得推敲的问题。大城市的限购若不挂钩户籍，何来婚托横行的诸般奇观？不挂钩户籍曾被明确为户改的规则之一，奈何一旦面临实际就全然无效。

社会学家正忧心忡忡地研究传统婚姻制度的解体，他们所依据的是更为驳杂的现象，如同性婚姻、丁克家庭、剩男剩女等等。若将限购时代的种种虚假婚姻也糅合进去，社会学家的悲观恐怕会再增加几分。这时候，我们已经忘掉了婚姻与爱的关联，它只是利益调整目标下各方运用纯熟的工具而已。少动用户籍，少动用婚姻，别拿它们作为达成治理目标的砝码，即便是于维护最庸俗的幸福而言，恐怕也是极有价值的。 周东飞

7月12日凌晨2点，五名醉酒男女大闹上海东方医院急诊室，对三名急诊护士拳打脚踢长达20多分钟，施暴者还向赶来的警察动手。无独有偶，7月10日北京安贞医院四名护士也被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群殴。

## 患者恶性袭医理应受惩

护士们的白衣被血染，打人者的戾气极为嚣张，与其说是医患关系紧张下的恶果，倒不如说是某些人成心作恶，甚至无端撒野——安贞医院护士挨打，只因医生正在手术，晚了几分钟；东方医院护士被打更无由来，一群恶鬼一面声称同伴剖腹自杀，一面却对医护人员展开全武行。

两起“袭医事件”，骇人听闻，必须依法惩处。医务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，医疗队伍将后继无人，将来谁来做医生护士？谁来为我们治病？事实上，这只是再次印证了，某些自恃有势力的人与社会上的混混，稍不如意就动粗，寻衅滋事要酒钱，身上痞气匪气很重。对于不守法律红线、恶性伤害他人的个人，法律当使其自食恶果。

但也不可否认，确有一些人对医院怀有成见，一些医患冲突是由医疗纠纷直接引发。有必要指出，医院固然是暴露医患矛盾的前沿，可一些问题不是医院单方面能够扭转，许多责任医院担不起来——看病难看病贵与不成功的医改有关，社保覆盖面不足、医保报销比例偏低同样难脱干系，政府投入不足也有待解决。当然，医疗机构也要有职业操守底线，医院即便不是福利院，也不能钻进钱眼里。医生与护士既需要享有合理的待遇，他们的实际行动也要配得上白衣天使称号。

患者同样要理性。生命科学还有许多密码未解，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，花钱治病不等于保证救命是严肃的现实。如果全力医治仍无力回天，更该尊重医生。反之，若确属医疗事故，或存在人为过失，可启动制度追责与法律赔偿。由此引出一问一题，谁来认定医疗事故？在卫生系统同体监督不具有足够公信力的情况下，有关方面应对专业的、独立的、第三方鉴定给予政策“松绑”，并且扶上马送一程。

改善医患关系，不能指望单向寻求理解。从大环境看，必须使医改走出不成功的泥沼，全力打破以药养医、以检查养医的怪圈，让医生回归医学取信于患者的本位。在不断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，更要警惕权力寻租，坚决打击医疗行贿与腐败，铲除医疗价格虚高背后的毒瘤。从具体着眼，医者必须怀有仁心，仁心才能实施仁术，仁心才能换得人心。有仁有心就不愁没有理解，融化偏见、解开心结才能水到渠成。 蒋萌